

台灣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大陸學者的觀點

Taiwa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Viewpoints from Mainland China Scholars

戴東清¹(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提要

儘管自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兩岸關係按照大陸學者的說法，走上了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然而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大陸學者稱為政治認同)，即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兩者皆是的比例，不但未朝向兩岸融和的方向發展，僅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反而屢創新高。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13 年 6 月公佈的資料顯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為 57.5%，比 2008 年的 48.4% 高出將近 10%。究竟中國大陸如何面對台灣此種政治認同與大陸日益分歧的現象？

大陸學者將台灣的國家認同視為影響建立兩岸政治互信的關鍵因素，也曾提出恢復及建構社會或歷史記憶；深化兩岸經貿合作，努力建構相互依賴的經濟共同體；透過加強兩岸文化交流提升「文化認同感」，進而提升「國家認同感」

¹本期刊論文獲南華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Email: dcd day@mail.nhu.edu.tw



等舉措。然而太陽花學運的發生，意味著過去的措施成效有限。近期更偏重討論如何以強化文化認同來增進政治認同，本文的目的在於評估此種作法是否確實有效能夠達成上述目的。

關鍵詞：文化認同、政治認同、身分認同、文化研究、經濟文流

dcday@mail.nhu.edu.t ...

Abstract: The trend of Taiwanese people identifying themselves as sole Taiwanese instead of both Chinese and Taiwanese that has reached the peak from time to time since KMT (Kuomintang) regained power in 2008.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conducted by the Election Study Center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2013, the ratio of Taiwanese people identifying themselves as sole Taiwanese is 57.5%, it is nearly 10% higher than that in 2008. How come China's authority to deal with the trend of identity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Mainland China scholars regarded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as a key factor to build cross-strait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proposed to restore and construct social and historical memory, deepen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to build mutual benefit economic community, promote cultural identity by enhancing cross-strait culture exchange so as to rais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However, the “Sunflower student protest” on anti-service trade agreement with Mainland China apparently indicates that the above measures are not working. Mainland China scholars have focused more on discussing how to enhance



political identity by way of strengthening cultural identity recently.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ry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new measure is able to reach the target.

Keywords: cultural identity, political identity, status identity, culture research, economic exchange



一、問題的提出

儘管自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兩岸關係按照大陸學者的說法，走上了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張文生，2010:1-8)然而台灣民眾的政治認同，即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兩者皆是的比例，不但未朝向兩岸融和的方向發展，僅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反而屢創新高。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13 年 6 月公佈的資料顯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為 57.5%，比 2008 年的 48.4% 高出將近 10%。(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3.6)

也正因為此種台灣政治認同的趨勢發展有點出乎大陸學者的研判，於是他們也提出不少縮短此種認同差距的辦法，其一是修復與建立共同記憶。例如，唐建兵在提升台灣「國族認同」的三項有效途徑中，將「修復歷史記憶」列為首要工作，認為中華文化主體性受到重大挑戰而弱化，是台灣民眾「國族認同」趨弱的致命弱點，也恰恰是兩岸工作今後的努力之需。(唐建兵，2012 年:139-144)陳孔立則指出，兩岸人民友好合作方面將建立美好的共同集體記憶，而建立新的歷史記憶、集體記憶、共同價值，可能是突破建構「雙重認同」或「兩岸認同」的關鍵所在。(陳孔立，2012:1-7)

其二，是透過經濟合作改變台灣民眾的政治認同。例如，徐曉迪在分析台灣民眾的認同新趨勢時，首先提到就是經濟層面的認同趨向，認為得益於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與外溢效應的幅射，為兩岸政治層面上的互動帶來契機，有助逐步改變島內民眾的政治傾向。(徐曉迪，2013:85-90)其三，文化交流亦被許多大陸學者視為改變台灣民眾「國家認同」趨向的重要途徑。例如康菲與劉向紅就表示，文化交流是提升「國家認同感」的重要方式，認為只要兩岸「文化



認同感」加強，「國家認同感」也會進一步提升，提升「文化認同」的重要方是就是加強兩岸的文化交流。(康菲、劉向紅，2012:59-62)

不過也有部分大陸學者對此提出警訊，林紅就指出兩岸經濟、文化、社會交流，可以作為連結認同的紐帶，更多的是一種邏輯推理。(林紅，2012:26-30)徐曉迪也表示，對台灣而言，再多的「惠台政策」，也很難強化台灣部分民眾對於中國的認同；讓更多觀光客來台，如果沒有強化彼此的認同措施，只是會增加彼此「不同主體」的感覺。(徐曉迪，2013:107-111)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太陽花學運，似乎印證了大陸學者所言：兩岸經濟、文化、社會交流，可以作為連結認同的紐帶，更多的是一種邏輯推理；再多的「惠台政策」，也很難強化台灣部分民眾對於中國的認同。

究竟大陸學者有否提出更有效縮短兩岸政治認同差距的辦法？綜觀近期文獻，強化文化認同很明顯成為有效方案之一，其可行性究竟如何？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為了達成上述目的，本文首先將針對大陸學者對於文化認同的內涵及其各個面向進行文獻回顧，著重討論為何在此時此刻，大陸學者會認為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在增加當中。其次，則是分析文化認同的利基與促進其發展的途徑。再次，則置焦點於文化認同在促進政治認同所面臨的問題、限制及轉化。最後，則是本文的結論，將綜合爬梳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關係。

二、文獻回顧：

(一)文化認同與台灣的現狀



大陸學者王麗紅指出，文化認同是基於文化而來的概念，係指一種個體被群體文化所影響的感覺，成為個人或集體界定自我、區別他者，加強彼此的同一感以凝聚成擁有共同文化內涵群體的標誌。(王麗紅，2013:473-480)王麗紅另外也表示，使用相同的文化符號、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規範，是文化認同的依據。(王麗紅，2013:473-480)若按照上述定義，兩岸同文同種，沒有理由在文化認同上存在重大差異，可是實際上卻彷彿不是如此。

此外，大陸學者也經常透過博物館(張羽，2009:13-17)、電影(吳明，2012:151-153)、文化文流(袁曙霞，2011:1-6)或者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之間的關係(俞新天，2013:25-28)，來論述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例如吳明就表示，台灣「文化認同」不可迴避的三大組成為：本土文化、日本文化、大陸文化，並以三位電影導演的作品，係完成在地尋根的文化自信、釐清日本情結的文化自覺，以及回歸大陸母體的震顫。(吳明，2012:151-153)不論三位導演是否真有其意，不過在吳明的觀點之中，尋根、釐清、回歸的三步曲，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只是作者也承認電影「轉山」的結局，是當代台灣文化向大陸母體回歸一次不太成功的試探。(吳明，2012:153)

無獨有偶地，馬英萍在探討「台籍日本兵問題之史料挖掘與文化省思研究」時，也指出「對於當代的台灣人來說，文化上的認同無非三種可能，即與祖國大陸認同，或親日，或台獨」。(馬英萍，2014:85-90)馬英萍也認為「看清歷史，有助於台灣在文化上脫殖民，有助於台灣在文化認同上回歸祖國大陸」。(馬英萍，2014:85-90)



不過，看清歷史與回歸大陸不必然存在因果關係，否則也不會出現所謂的回歸不太成功的現象。更何況回歸不成功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台灣的中華文化與大陸的中華文化已經出現重大差異，二是大陸根本不存在傳統的中華文化，以致於缺乏回歸的對象。若是電影可以呈現文化認同的面貌，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實際上是在朝向重塑而非回歸大陸的路途上發展。

誠如孫慰川與賈斌武所言，2000-2004 是一個頗為獨特的階段，這一時期的台灣電影通過對青春、自然與地方感的強調，在銀幕上初步建構了新的台灣形象；2005 年後的台灣電影實際上延續此階段台灣電影所確立的主題，在銀幕上建構新的台灣形象。(孫慰川、賈斌武，2014:106-109)前者為初步建立，後來顯然就脫離了初步，而是愈來愈傾向建構完成。而此種台灣新形象的建構完成，大陸因素並未參與其中，因此兩岸文化認同差異日鉅亦可理解。朱崇科在討論南洋作家潘雨桐的作品時引用劇中人物話語指出：離散會有結束的一天，一旦移民定居並變得土地化，第二或第三代會選擇結束離散的狀態……，因此，強調離散會有終結的一天便是堅持認為文化和政治實踐始終是以在地為主。(朱崇科，2014:39-49)

不論是從大陸因素未在台灣重構文化認同中參與，或者是從離散終究會選擇結束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文化認同，都可明顯看出台灣的中華文化與大陸的中華文化已經出現重大差異，前述所說的不太成功的回歸，顯然是受到兩岸在文化認同上存在重大差距的影響。若是大陸學者無法認清兩者的差異，勢將無法藉由促進文化認同來達成增進政治認同的目標。



(二)文化認同何以重要

大陸學者俞新天表示，強調文化是因為「文化認同」是一切認同的基礎，也認為兩岸人民在「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上的分歧明顯，短期內難以消除，從培固「文化認同」入手，對於拉近兩岸人民心靈距離，共同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至關重要。(俞新天，2013:25-28)從俞新天的觀點可看出，大陸學者對文化認同的重視程度，因為它是一切認同的基礎。換言之，文化認同是下層建築，下層建築不穩，政治認同等上層建築又如何能發展呢？

也正因為俞新天將「文化認同」視為是「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基礎，以致於忽略台灣文化內涵的特性，才會認為不該以台灣文化多元性來否定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甚至得出台灣「文化認同」具有傲慢與偏見的結論。(俞新天，2013:26-27)此外，唐建兵則從「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歧異，來說明若是兩者不能合一就造成「國族認同」的迷失。他認為狹義的「民族認同」等同於「族群認同」，是指民族成員對於構成本民族與眾不同遺產的價值觀、象徵物、記憶、神話和傳統模式等的認可與共識；廣義的「民族認同」即為「國族認同」，包括漢族在內的 56 個民族對數千年中華傳統文化、歷史記憶及國民身份等方面的認可與共識。(唐建兵，140-141)

很明顯地，唐建兵認為獨尊中華文化，是構成中國「國族認同」的重要部分，也正因為台灣已經不再獨尊中華文化，所以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才會出現所謂的「斯德哥爾摩困境」。(唐建兵，141)同樣地，劉強也認為，因為兩岸隔離，特別是在日本殖民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台灣走上了一條與大陸明顯不同的發展道路，從而使台灣民眾形成與大陸同胞迥然相異的社會記憶。(劉強，2011:60-80)所以在劉強



的觀點中，就認為台灣民眾的社會記憶，普遍形成了家國飄零和迷茫悵惘的心理，產生了深深的不安全感與焦慮感。(劉強，2011:61) 同樣的分析觀點也出現孫慰川、楊雯的研究結論中；他們認為由於「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無法統一，以致於造成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的迷失。(孫慰川、楊雯，2012:137-141)

很明顯大陸學者都是以大陸為主體來看得台灣文化或文化認同的發展，以致於認為台灣民眾出現「斯德哥爾摩困境」、「家國飄零和迷茫悵惘的心理」。實際上不同的社會記憶原本就沒有什麼正負向之分別，但是因為台灣民眾的社會記憶及其對「國族認同」的影響與大陸學者理解的認知有差距，就被認為是一種「迷失」。若是大陸學者無法從互為主體的角度出發，恐怕很難真正認清台灣文化及其認同的特點，即使凸顯其重要性，恐亦難藉以達成增進政治認同的目標。

文化認同受重視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想要藉由經貿關係增進政治認同的效果不彰。例如，吳偉興就認為「文化認同」是「國家認同」的起始與結果，是民族主義的核心；近年來兩岸經貿關係取得突破性進展，而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卻相對滯後；從目前狀況看來，「以經濟促政治」的效果並不明顯，兩岸經貿關係突飛猛進的同時，台灣當局並未在政治上作出讓步，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認同也沒有明顯改善。(吳偉興，2014:52-55)嚴志蘭也表示，經濟交流與「政治認同」不但不會自然銜接，持續滑落的台灣民眾「中國認同」趨勢與兩岸熱絡頻密的經貿往、民間交流形成明顯反差。(嚴志蘭，2014:197-209)董紅也警告，在兩岸經濟交流把兩岸民眾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同時，不能盲目樂觀已有的成就而忽視兩岸經



濟交流，為台灣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更要理性思考兩岸的和平發展戰略。(董紅，2013:49-52)

既然經濟手段沒有辦法縮短彼此的「政治認同」差距，透過文化交流以強化文化認同，進而增進彼此的「政治認同」，就成為不得不然的替代手段。由上述學者的論述可知，當前文化認同已經成為拉近兩岸政治認同非常重要的面向，尤其是在經濟交流效果有限的時候，強化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就更高。

三、文化認同的利基與促進途徑

不少大陸學者無視於兩岸在文化認同上已有差距，仍然認為台灣民眾與大陸民眾在不論在文化認同，以及文化內容及形式與價值，都存在高度一致性或趨同性，對於促進政治認同有利。例如周少來就指出，相同的語言和文字使兩岸人民的交流與互動更為親切與便利；傳統儒家的道德倫理在兩岸的互動交流中提高了基礎性的相同價值取向；在傳統文化的轉型取向上有著相同的現代化價值指標。(周少來，2014:101-108)

此外，陳培永也表示，中華傳統文化的印跡根深蒂固地存在於台港澳地區，早已成為維繫台港澳民眾和大陸情感的自然紐帶，讓兩岸民眾分享著共同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節日禮儀、宗教信仰、藝術形式、倫理規範、心理情結、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即使那些別有用心強調台港澳文化的獨特性，試圖將其從中國文化區分出去，也不得不正視這種共同的文化傳統；人為地割裂台港澳文化與中國文化，注定碰得頭破血流。(陳培永，2014:39-44)此種將文化視為鐵板一塊，完全不會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的描述，還頗令人嘆為觀止。



此外，廖中武更認為，台灣居民多為大陸移民，歷史上大陸幾次大規模居民遷入台灣，造成了台灣文化與大陸文化的相通性，在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與大陸相同或相近。(廖中武，2014:59-63)廖中武並進一步指出，台灣文化從根本上仍然屬於中華文化，台灣文化在日據時期、在與大陸隔絕對立時期，仍然將中華文化的核心保存下來，某些方面甚至保存得比大陸還要完整和地道，也正是這種文化特性，經過多年不同的歷史發展進程，兩岸人民作能很容易地在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語境裡找到共同點；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在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中起著重要作用。(周少來，2014:101-108)

這樣的論述看似言之成理，但是卻沒能回答的問題是英國與美國，甚至與澳洲紐西蘭都有相同的文化相通性，為何未在「國家認同」或「政治認同」上產生趨同的作用？既然台灣在保存中華文化方面做得比大陸還好，不就化表兩岸在文化相通性上其實存在重大差距嗎？這應該是大陸學者在探討台灣具有中華文化認同利基的同時不得不去思考的問題。

當然台灣競爭力論壇 2013 年 3 月採取融合式民調，得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占 61%，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比例高達 90.4%。(周少來，2014:102)這樣的調查無非讓大陸學者對兩岸認同的拉近增加不少信心。例如，周少來就對此表示，同種同源的中華民族認同，奠定了兩岸和平發展最深厚的基礎，也是兩岸共同認同「一個中國」最深厚的基礎。(廖中武，2014:59-63)也正因為台灣人的中華民族認同似乎與中國大陸的認同相近，也有促進文化認同、進而強化政治認同的作用，有關強調中華民族認同的文章就紛紛出爐。



杜力夫與游志強就用「兩岸憲法共識之一：對中華民族認同的共識」，來說明中華民族是幾千年來生活在中國領域內各民族人民的總稱，兩岸現行「憲法」都對此予以首肯，形成了對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憲法共識。(杜力夫、游志強，2015:47-49)他們並認為兩岸執政當局在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的問題上的看法完全一致，對「中華民族認同」有著充分的共識。(杜力夫、游志強，2015:47-49)

當然亦有將中華姓氏文化與政治認同或國族認同作聯結的研究。就如同戚嘉林所指出的，族譜聯結祖先、蘊育國族認同；中華姓氏、聯結祖國；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投降，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台灣人立刻恢歸祖先的中國姓氏；中國人的姓氏文化，不但是慎終追遠的美德，也是形塑凝聚兩岸國族認同重要的組成部分。(戚嘉林，2014:66-68)

同樣與二戰有關的是，楊勝雲透過乙未年清廷割台的歷史，來說明該事件是中華民族近代史的苦難篇章，並表示面對新的歷史形勢，兩岸中國人應本著「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在相互瞭解理解、交流合作中增進認同和情感，捐棄歷史恩怨，化解歷史心結，共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致力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楊勝雲，2015:49-52)

即使上述說法均為真，但是要從「中華民族認同」過渡到「政治認同」，恐怕還有鴻溝要跨越，更何況中華民族認同在台灣的情況是否如其所述，尚有討論空間，否則難以說明為何政治對話難以推展。更何況前述台灣競爭力論壇的中華民族認同的調查，與台灣民眾的認知相去甚遠，也與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長久從事的認同調查有異，難以作為台灣民眾認同現狀的證據。



除了強調兩岸文化具有共通性，以及人民同屬中華民族，說明兩岸在文化認同及民族認同具備高度一致性外，大陸學者也提出不少強化文化認同的措施建議。其一是透過文化與教育交流手段擴大重塑認同的基礎。王麗紅就建議，需從台灣政治文化與教育改革領域的撥亂反正入手，打牢重塑認同的根基；從普通人的經歷中尋找歷史的大記憶，切實抓住重塑的主體；從兩岸共同的歷史關切中發掘切入點，找準重塑認同的歷史驅動力；逐步將兩岸關係改善引入雙方教育體系，在交流中擴大重塑認同的現實基礎；以打造引領世界發展的新型中華文化為契機，為兩岸重塑認同增添新助力。(王麗紅，2013:477-480)不過，兩岸不論是面對日本二戰責任、兩蔣的歷史定位以及教育制度，都存在重大差異情況上，要藉由這些面向來增進文化認同，能發揮多大效果仍待進一步檢視。

其二則是將台灣文學納入中國文學的框架之中。張祖群就指出，要反思兩岸僵硬的打壓和反彈模式，在「中國文化」的旗幟下，重新辨析、重新認識台灣鄉土文學，認識到它原本就是中國文學框架之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張祖群，2014:103-120)不僅如此，張祖群也進一步說明，文學的內在意義在於重建基於文化認同的價值觀，乃至於合在一種文化地理格局之下；文學持有者與書寫者應該發揮其「軟性」文化功能，以有效促進文化認同，同時實現個人、民族、國家認同的和諧共存。(張祖群，2014:103-120)

其三，則是建構兩岸命運與生活共同體。嚴志蘭就表示，構建兩岸命運與生活共同體，充實兩岸共同認同的社會基礎，是增進文化認同的重要手段；因為兩岸交流貫穿到文化和私人領域，由此形成弱政治性的新型社會認同，具有影響台灣民眾認同意識、建構兩岸共同認同的著力點。(嚴志蘭，



2014:208)劉國深則更進一步指出，從血緣、文化、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等不同角度發現海峽兩岸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命運共同體關係，兩岸分離的經歷並沒有從根本上摧毀這些關係，說明兩岸命運共同體有著深厚的基礎。(劉國深，2014:38-42)

若是政治打壓和反彈模式確能改善，應對強化台灣對中華文化的「文化認同」有幫助，然而若再度發生類似在東京影展的文化打壓行為，「軟性」文化功能要發揮，恐亦有其難以實現之處。其次，若台灣的文化認同對建構兩岸命運與生活共同體存在如此多的利基，馬上要面臨的問題就是，為何文化認同未能反映在強化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政治認同上？尤其是當 2016 年台灣民眾選出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籍，且認為台灣年輕具有「天然獨」特性的總統，(李欣芳，2014.7)，無異說明台灣民眾的政治認同離大陸愈來愈遠。出現此種現象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台灣文化認同的本身就與大陸學者認知的有所差異，二是台灣文化認同轉化有利縮短兩岸政治距離之政治認同的時間尚未來到。

四、促進文化認同的限制與轉化

(一)促進文化認同的限制

儘管有不少大陸學者認為兩岸都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文化，認同中國傳統文化，這就是文化認同；中華文化是兩岸人民認同的基礎，中華民族認同是台灣大多數人的共識，也是兩岸聯結節紐帶，但是陳孔立卻提出另外一種看法，認為文化認同還應包括後天建構的制度認同、心態認同，特別是價值觀、思維模式、社會心理、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內容，說明「原生論」與「建構論」的文化認同還是存在區別。(陳孔立，2014:1-4)



基此，陳孔立首先舉了美國、歐洲、澳洲及新加坡為例，說明不是有了特定的文化認同，就會有相對應的政治認同或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是政治認同的前提與基礎」這個論點經不起歷史與現實的檢驗，在很多場合不適用，不要把它當成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真理。(陳孔立，2014:1-4)其次，對於認同中華傳統文化能否達成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陳孔立也是抱著懷疑的態度。姑且不論兩岸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看法很不一致，陳孔立更指出，台灣與大陸年輕一代已經不談傳統文化了，怎能期待透過傳統文化的認同來達成政治認同呢？(陳孔立，2014:1-4)最後，陳孔立表示，兩岸文化認同不是要大陸認同台灣的文化，也不是要台灣認同大陸的文化，而是要走相互整合的道路，需要以理解和包容的態度對待對方，才能共同建構新的文化認同。(陳孔立，2014:1-4)

由於兩岸相互隔絕已超過一百多年，彼此在文化認同上的互動更多的是像張祖群所講的「僵硬的政治打壓和反彈模式」，要做到「理解和包容的態度對待對方」非一蹴可幾。郭震遠對此也有清楚的描述，他認為儘管兩岸文化同根、同源、同屬一個民族，但由於長時間隔絕，實際上兩岸文化已經存在一些差異，語言、文字、歷史觀、社會心態等等，都已有或多或少的差異，這些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不能視而不見。(郭震遠，2016：67)換言之，若是對於此種文化差異視而不見，就很難找對方法來強化認同，這應是過去中國大陸希望透過強化文化認同以增進政治認同措施未能奏效的原因。

不僅如此，既然文化認同不是政治認同的前提與基礎，建立新的文化認同後呢？真的能在促進政治認同上發揮應有的作用嗎？關於中華文化作用小，尤其是在年輕人身上影響小，也可以證諸蘇頌興等的研究。他們舉調查資料說明，



台灣年輕人「被中華文化、大陸山河所感動」的只有 16.1%，遠遠不及於「被大陸經社發展觀察所震懾」的 50.0%，也不如「與接待人員/學員互動的感受」的 32.1%。(蘇頌興等，2014:24-31)有此調查反應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台灣青年普遍認為不僅中華文化在台灣保留得最好，而且對於台灣的文化、時尚、創意產業所取得的成就頗有自豪感。(蘇頌興等，2014:24-31)這無異說明，要中華文化作為文化認同的核心，有頗大的困難，尤其在年輕人這一代身上更不容易。

關於台灣年輕人的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台灣學者謝大寧亦有相互呼應的研究。他指出在 18 歲到 30 歲之間的人口，大約有三分之二已經不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也不再認為自己隸屬於中華文化圈。(謝大寧，2014:8-14)面對如此的年輕世代，試問要如何以中華文化來建立文化認同的紐帶呢？這也就難怪謝大寧會語重心長地表示，台灣現在所存認同斷裂的現象，才真正是兩岸所謂深水區的核心，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兩岸想從現狀再往前走，都將舉步維艱。(謝大寧，2014:8-14)

大陸學者儘管也注意到文化認同的侷限性，但是對於文化認同斷裂及其所導致的民族認同斷裂問題，似乎尚未有所警覺。這也就是為何郭震遠即使認識到兩岸文化差異不可視而不見，卻仍然認為可以透過擴大兩岸文化交流可以消除此種斷裂式的認同差異之根本原因。(郭震遠，2016：68)也正因為對於此種文化認同斷裂認識的有限，周天柱才會在去年反服貿學運發生後，得出「學運重創民進黨在沉默多數中的形象，面對年底『七合一』選舉及 2016『總統』選舉，藍營意外獲得一個大利好」的結論。(周天柱，2014:21-23)結果藍營不但沒有獲得一個大利好，反而在 2014 年底的「七合一」（另稱「九合一」）選舉大敗，甚至影響了 2016 總統



選舉的佈局，這或許是因為對台灣年輕一代文化認同斷裂的不理解，所以才會得出此種錯誤的判斷。

(二)促進文化認同的轉化

大陸學者王英津表示，自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2 年接任中共總書記以來，先後提出「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兩岸心靈契合」和「兩岸融和發展」等等，此等論述被視是為希望能達到「兩岸融合發展」的目標。（王英津，2017：5）他進一步闡釋，兩岸融合發展就是培養、澆築和鞏固「兩岸一家親」、「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理念的重要途徑。（王英津，2017：5）

如前所述若是大陸方面對兩岸存在斷裂式文化認同差異不瞭解，再多的交流也是枉然，否則難以解釋為何如此多的兩岸文化交流，改變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效益十分有限。因此，若要縮短兩岸此種文化與政治認同的差距，勢必要另起爐灶。倡議融合發展或許是有限途徑之一。王英津特別將融合發展與交流發展的差異進行比較分析如表 1。

表 1 兩岸交流發展與融合發展

比較內容	交流發展	融合發展
利益關係	增進各自利益；台灣是台灣，大陸是大陸	更多是增進共同利益，台灣的之中有大陸，大陸的之中也有台灣。但目前是台灣還是台灣，大陸的之中有台灣。



政黨輪替影響	受政黨輪替影響明顯	不受政黨輪替影響明顯
推動力量	兩岸官方共同推動	目前大陸單方面推動
參與主體	不僅限個人、企業等民間層面，而且還包括機構、被授權組織等公權力層面	主要是個人、社團和企業等民間層面
實現平台	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和大陸所搭建的區域性國際平台

資料來源：王英津，2017：9

從交流發展與融合發展的差異比較，很明顯可以看出融合發展係由大陸單方面推動，不論有無台灣方面的配合。有此構想與措施應是大陸方面認為台灣官方是過去深化兩岸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阻力，因此融合發展的倡議，將越過台灣官方的角色，直接面對台灣的民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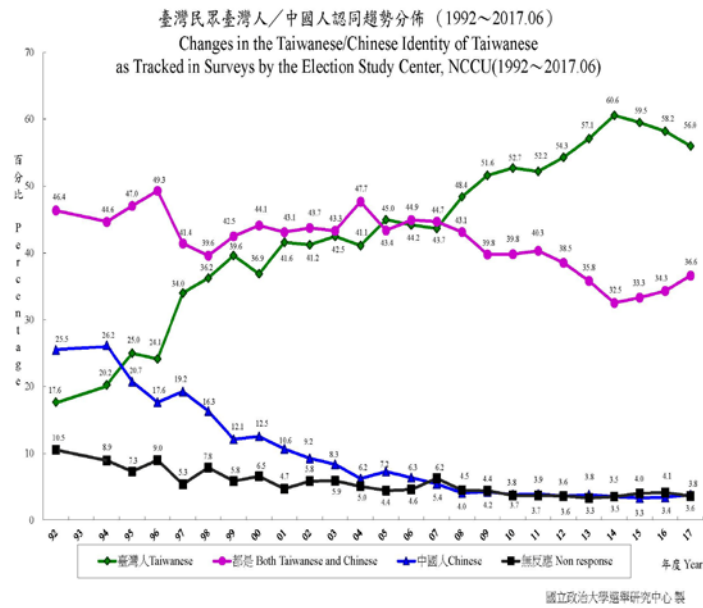
為了落實融合發展的效益，王英津建議要為台灣民眾提供「居民待遇」（即國民待遇），認為此舉不僅可方便台灣民眾在大陸投資、工作、就業、居住及旅行，更重要是有助於提高台灣民眾的中國認同和國民意識，從而確立鞏固「兩岸一家親」的理念。（王英津，2017：9）剛落幕的中共「十九大」引發台灣輿論重大關注的焦點之一，莫過於在台灣高雄旗山土生土長的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盧麗安獲選為黨代表。（李靖棠，2017.10）

盧麗安表示，當初會加入共產黨，是因為觀察這個黨是一個信念堅定、心繫人民、與時俱進的政黨，執政成績非常好，因此決定申請入黨，也以自己經歷鼓勵台灣青年，要擺



脫對大陸的成見，以誠相待。（胡明明，2017.10）盧麗安不僅自己認同中國共產黨，還鼓勵台灣年輕人要有同樣的認同，也意外引發一些在大陸就學的博士生跳出來要投共。（鄭仲嵐，2017.11）這雖然不能說是融合發展的措施見效，但無疑是對融合發展策略打了一劑強心針。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個趨勢，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關於台灣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資料顯示（參見圖 1），台灣民眾的台灣人認同自 2014 年達到高峰後，最近三年都經呈現下降的趨勢，可說是與大陸近期推動融合發展策略呈現正相關的關係。兩者之間是否為因果關係，尚需進一步檢證，不過對近期大陸推動融合發展策略應是正向的影響。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 <http://esc.nccu.edu.tw/app/news.php?Sn=166#>



五、結論

為了改變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趨向，大陸學者提出恢復及建構社會或歷史記憶；深化兩岸經貿合作，努力建構相互依賴的經濟共同體；透過加強兩岸文化交流提升「文化認同感」，進而提升「國家認同感」等舉措。此等舉措的功能，似乎未在改變台灣民眾「政治認同」的傾向上產生效果。兩岸經濟、文化、社會交流，可以作為連結認同的紐帶，更多的是一種邏輯推理，而非可實踐的措施。

既然更多的經貿交流與惠台措施，對於改變台灣民眾的「政治認同」沒有助益，強化「文化認同」或「民族認同」，進而使其過渡到「政治認同」就成為大陸學者在經貿措施未能奏效後的最佳替代方案。著重「文化認同」是因為其一切認同的基礎，兩岸人民在「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上的分歧明顯，短期內難以消除，從培固「文化認同」入手，進而為增進政治認同提供助力，或可成為可行途徑之一。

不過，亦有大陸學者舉國外例證，說明不是有了特定的文化認同，就會有相對應的政治認同或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是政治認同的前提與基礎」這個論點經不起歷史與現實的檢驗。更何況台灣與大陸年輕一代已經不談傳統文化了，怎能期待透過傳統文化的認同來達成政治認同呢？根據調查資料顯示台灣年輕人「被中華文化、大陸山河所感動」極為有限，遠遠不及於「被大陸經社發展觀察所震懾」，也不如「與接待人員/學員互動的感受」。有此反應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台灣青年普遍認為不僅中華文化在台灣保留得最好，而且對於台灣的文化、時尚、創意產業所取得的成就頗有自豪感。這無異說明，要將中華文化作為台灣文化認同的核心，有頗大的困難。大陸方面若要透過文化認同來強化台灣民眾



對大陸的政治認同，必須正視及彌平此種文化認同斷裂的現象。

或許是因為有感於交流發展在增進兩岸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效用不彰，大陸自習近平主政後主導融合發展。交流發展與融合發展兩者的最大差異在於越過台灣的官方角色，由大陸官方直接來面對台灣民眾，透過國民待遇等措施提高台灣民眾的中國認同和國民意識。台灣高雄旗山土生土長的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盧麗安獲選為中共黨代表，以及意外引發的台灣青年學子投共潮，加上台灣民眾台灣人認同在最近三年呈現下降趨勢，雖不能說是完全受到大陸推動融合發展的影響，但是兩者呈現正相關關係，值得未來進一步檢證。



參考文獻

- 王英津（2017）。融合發展：大陸推進和平統一新思路，**中國評論**，第 232 期，5-12。
- 王麗紅（2013）。認同的異化與重塑—對當前兩岸關係發展困境的跨文化思考，**中國媒體發展研究報告**，473-480。
- 朱崇科（2014）。後殖民時化的身份焦慮與本土形構—台灣經驗與潘雨桐的南洋敘述，**華人華僑歷史研究**，6 月第 2 期，39-49。
- 吳明（2012）從在地尋根到嘗試回歸—三位導演處女作中的台灣文化認同新轉向，**當代電影**，12 期，151-153。
- 吳偉興（2014）加強文化交流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4 月第 2 期(總 188)，52-55。
- 李欣芳（2014）。小英：台獨是年輕世代天然成分，**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97533>
- 李靖棠（2017）。高雄出身，盧麗安獲選陸十九大黨代表，**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004001967-260409>
- 杜力夫、游志強（2015）。兩岸憲法共識之一：對中華民族認同的共識，**中國評論**，第 206 期，47-49。
- 周天柱（2014）。關於「反服貿」學運的若干思考，**中國評論**，第 197 期，21-23。
- 周少來（2014）。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傾向及對兩岸政策的影響，**江蘇師範大學學報**，40 卷 2 期，101-108。



- 俞新天（2013）。當前兩岸文化認同的問題與前景，**中國評論**，第 1 期，25-28。
-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3，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
<http://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6#>。
- 胡文生（2006）。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問題的由來、歷史及現實，**北京聯合大學學報**，第 4 卷第 2 期，83-88。
- 胡明明（2017）。台籍代表盧麗安：入黨因信服黨堅定信念和執政成績，**大公網**，
<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7-10/3505384.html>
- 唐建兵（2012）。潛在危局：台灣民眾國族認同論析，**嘉興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4 期，139-144。
- 孫慰川、楊雯（2012）。論新世紀初期台灣電影的國族認同迷失，**當代電影**，第 10 期，137-141。
- 孫慰川、賈斌武（2014）。身份認同危機與台灣形象重塑——論 21 世紀初期的台灣電影，**當代電影**，第 6 期，106-109。
- 徐曉迪（2013a）。試析論台灣部分民眾國家認同的發展趨勢，**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1 期(總 94 期)，107-111。
- 徐曉迪（2013b）。「鏡像認知」到「增量認同」：台灣民眾國家認同趨向研究，**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4 期(總 182 期)，85-90。
- 袁曙霞（2011）。兩岸文化大交流對台灣同胞認同的影響研究，**貴州師範學院學報**，第 27 卷第 10 期，1-6。



- 馬英萍（2014）。台籍日本兵問題之史料挖掘與文化省思研究，**台灣研究**，第 4 期，85-90。
- 康菲、劉向紅（2012）。大力加強兩岸文化交流提昇台灣同胞國家認同感，**理論界**，11 期(總 471 期)，59-62。
- 張文生（2010）。兩岸政治互信與台灣民眾的政治認同，**台灣研究集刊**，第 6 期，1-8。
- 張祖群（2014）。文學何以療傷—簡論台灣海峽的政治傷痕，**青島科技大學學報**，30 卷第 2 期，103-120。
- 郭震遠（2016）。面對重要歷史節點，深化兩岸文化交流，**中國評論**，第 208 期，64-68。
- 陳孔立（2012）。從「台灣人認同」到雙重認同，**台灣研究集刊**，第 4 期(總 122)，1-7。
- 陳孔立(2014)。兩岸文化研究的盲點，**台灣研究**，第 4 期，1-4。
- 陳培永（2014）。「一國兩制」與台港澳的中華民族向心力，**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4 期(總 75)，39-44。
- 鄭仲嵐（2017）。台籍盧麗安的「中國夢，樣板意外掀起的「投共潮」，**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18408>
94。
- 楊勝雲（2015）。乙未割台的殤思及對兩岸的啟示，**中國評論**，第 208 期，49-52。
- 董紅（2013）。淺談兩岸經濟交流與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關係，**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6 期，49-52。



- 廖中武（2012）。政治社會化：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建構路徑，**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4 期，69-74。
- 廖中武（2014）。海峽兩岸政治溝通和整合中文化的價值和效用，**福建行政學院學報**，第 1 期(總 70)，59-63。
- 劉國深（2014）。試論深化兩岸政治互信的社會基礎，**中國評論**，第 203 期，38-42。
- 劉強（2009）。兩岸互動與國家認同—基於台灣民眾分析的視角，**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4 期(總 160 期)，59-63。
- 劉強(2011)。社會記憶與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中華文化**，第 2 期(總 70)，60-80。
- 謝大寧（2014）。從反服貿學運看兩岸文化協議，**中國評論**，第 198 期，8-14。
- 嚴志蘭（2014）。台灣民眾認同問題的歷史與現實，**東南學術**，第 1 期，197-209。
- 蘇頌興等（2014）。台灣青年「一中」認同與兩岸發展，**青年探索**，第 3 期（總 188 期），24-31。

